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1.015

“科学文化自信”的出场学研究

伍光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科学文化自信”是一种基于科学文化的文化自信,提出这一概念旨在说明:科学文化自近代以来就一直充当中国文化发展的增量,正是因为科学文化不断内化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成分,才使中国文化从自大走向自谦、自省,从自觉走向自信、自强。建构“科学文化自信”就是要把科学文化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程,自觉顺应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逻辑旨归,切实回应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诉求,实现推动科学文化发展和提升文化自信的双重功效。依据出场学的理论逻辑,即从“何为科学文化自信”“建构科学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如何建构科学文化自信”三个方面,构建“科学文化自信”的出场逻辑与路径,可以促进科学文化与文化自信的相向研究,并在两者研究的交叉域探寻新时代文化强国的新资源和提升文化自信的科学文化新路径。

关键词:科学文化;文化自信;科学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1-0111-08

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识,也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和焦点。从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对文化自信的研究主要沿历史维度,即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去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础,并以此作为提升路径。这对于理解与掌握习近平总书记文化自信的理论是重要的,但就学术研究的深度而言,其实是停留在文化自信的解读与诠释层面。此外,也有学者把文化自信当作不证自明的客观存在,并以此为前提展开宣教、践行等实践层面的探讨。这对于贯彻我国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大有裨益,但就学术研究的方法而言,其“合法性”有待商榷,且容易陷入“不能以理服人”的窘境,往往只能借助于“以情动人”来代替“以理服人”。

从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为切口研究文化自信,总体属于纵向研究的范畴。学界对纵向维度的过分热衷,造成对文化自信横向维度研究的不足,特别是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科学文化对于文化自信生成与提升的重要意义。科学文化具有横向性,渗透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全程和全境。从科学文化视角探讨文化自信是对历史维度研究的重要补充,且更

具根源性。“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笔者不揣鄙陋,大胆提出“科学文化自信”的概念,即“文化自信也是建立在科学文化基础上的自信”,其旨趣有二:一是理论上阐明科学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可或缺的要害,对于文化自信的夯实和提升存在根源性意义,确立“科学文化自信”同样是文化自信重要来源的理念,以此丰富和深化对习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理论的理解。二是实践上推动科学文化与文化自信两者研究的双向趋近,在其交互视域中挖掘新时代文化强国的支撑资源。

本文主要围绕“何为科学文化自信”“建构科学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如何建构科学文化自信”三个层面来阐发“科学文化自信”的出场逻辑与出场路径。

一 “科学文化自信”的概念

“科学文化自信”由科学文化与文化自信构成,一端是科学文化,另一端是文化自信。但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对科学文化与文化自信两者结构与功能、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机

收稿日期:2020-09-28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YJA720017)

作者简介:伍光良(1969—),男,江苏淮安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研究。

整合和重新契合,以期建构一种以科学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自信。为避免理解上的歧义,对“科学文化自信”涉及到科学文化和文化自信先作一个界定。

关于科学文化的定义有百种以上,学术争论由来已久,至今不绝,但共识还是有的。一般说来,科学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科学文化是科研共同体在探索自然奥秘、追求真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科研活动中,形成的共同思维方式、心理习惯、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的集合,主要是指存在于科研共同体身上唯实、求真、创新的科学精神以及理性质疑、真理至上、开拓创新的科学气质^①。随着狭义科学文化不断向社会领域延伸和渗透,它会引导社会大众相信科学,并启迪大众对自然世界、未来世界的理性思考,狭义科学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一旦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就完成了向广义科学文化的嬗变,此时科学文化的主体不仅是科研共同体,更多是指社会大众。另外,社会大众通过学习和训练,比如系统地学习科学知识,在工作和生活中长期运用科学方法,也会产生广义科学文化,这也是人们常说的科学文化素质。“科学文化自信”中的科学文化是广义科学文化,主要是指蕴含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伦理、科学规范、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是社会大众自觉遵循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方式^②。当然,科学文化内涵的稳定性是相对的,随着科学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科学对社会的渗透加剧,不断有新的要素加入科学文化之中。正如皮克林所说,科学文化不是统一的、整体的东西,可能是多个不同的、甚至异质要素的集合体^③。科学文化是多维度的,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这可能是对科学文化难以精确定义的主要原因,本文不介入其中的讨论。

“科学文化自信”的主词是文化自信,即基于科学文化的文化自信。当前学界论及的文化自信主要是指对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并逐渐形成的心理自信,其依据是习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三大理论”。一是“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理论。文化自信是更基

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文化自信^④。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源”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⑤。三是“文化自信的三大来源”理论。文化自信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⑥。关于文化自信的理论研究,学界精力主要集中在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整理革命文化以及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方面,并以此作为夯实和提升文化自信的主要路径,其中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重中之重。关于文化自信的实践研究,也是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发扬革命文化以及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个方面展开。同样的道理,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重中之重。

科学文化具有渗透性,是一种横向性文化,它渗透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从生发过程来看,三种文化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且逻辑上相通。这种相通,也表现为科学文化上的相通,即科学文化贯穿其间,并融通全盘。学界根据习总书记“文化自信的三大来源理论”推演出传统文化自信、革命文化自信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的概念,这属于纵向推演。既然可以纵向推演,也就可以横向推演,况且科学文化更具根源性,“科学文化自信”出场的逻辑合理性就在于此。

二 建构“科学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创新的时代,必然催生出创新的思想。“科学文化自信”因时而出,因势而出。

近代以降,中国便成了世界的一部分,不仅是历史上的,更是逻辑上的^⑦。科学文化不仅是一种西方文化,更是一种世界文化,它一直充当中国文化发展的增量,并不断冲击和修正作为存量的传统

①颜实:《科学文化建设的思考》,《科技日报》2014年8月13日。

②王春法:《科技事业发展呼唤科学文化建设》,《青海科技》2016年第3期。

③Pickering. 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 Chicago: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5. p.55.

④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⑤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⑦伍光良,吕乃基:《启蒙运动的路线图及其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8期。

文化,从而内化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成分。科学文化让中国人从文化自大走向文化自谦。中国人正是吸取科学文化,并用科学文化改造传统文化,才使中国文化走上自省、自信和自强的道路。“科学文化自信”既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逻辑旨归,也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诉求。

众所周知,近代科学不是源于中国传统科学,中国的科学与科学文化都是“拿来主义”的。在“拿来主义”当初,并不存在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只是西方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交锋、交融中,不断内化为中国文化而呈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这一过程漫长而又曲折,溯源于明清之际,起步于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形成于新文化运动,其间因民族战争、国内战争、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些时段,几度中断,又几度桥接。时快、时慢、时停,甚至暂时性倒退,构成了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常态。

大致对应着中国的晚明时期,西方国家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近代科学开始萌发,并蓬勃发展。此时西方国家已经跃上人类文明顶峰,中西方的文明已经出现了等级差别。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国家普遍建立,市场经济在西方也初步成型。为了开辟世界市场,西方国家派出了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出于传教的需要,即论证基督教比中国宗教(这里是广义的宗教概念,主要指儒家学说,也包涵佛教、道教等思想)有更高的“合法性”,传教士也带来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方法和理念,比如牛顿力学、欧氏几何、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等就是此时来到中国。尽管这些西方科学并不是当时最新的科学成果,但打破了中西方科学在相互隔绝状态下的平行发展,算得上是中西方“伟大文明之间第一次真正实质性接触”^①。明末科学家徐光启对传教士大加赞赏:“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②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知识阶层已经敏感地认识到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文化与中国文化明显异质,也与历史上曾经遭遇的、可以用儒家文化同化的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不同。这表明在明朝末年,中国文人的先进分子已经从文化自大走出来,走向文化自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当时中西方文化存

在明显落差,但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而且是在和平友好的环境下进行的。当然“西学东渐”是大潮,但也存在着“东学西传”的回流,两者相互激荡,造就了“一次互相的启蒙”。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西方国家虽然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锋芒已露,但中西双方“综合实力”大致相当,西方国家不足以蛇吞象,很难以武力使中国臣服。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西方传教士并没有俯视、而是平视中国文化,甚至发现中国文化之长可补西方文化之不足,“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③。非常可惜的是,在康乾时期,清朝的统治者逐步关闭了文化交流的大门。等到再次打开国门是伴随着洋枪洋炮的被迫打开,时间又隔了一百年,此时中西方“综合实力”已经是云泥之别,高下立判。本来中国是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切入世界文明进程,更早地实现社会近代化转型,但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错失了这一历史机遇。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厄运,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从最初学习“火器”类的实用性技术,渐次是技术背后的科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从制度到文化,从理论到实践。中国人对科学文化的学习大致沿袭器物、制度,再到理念的进路,在这一进路中始终伴随着中西文化“体用”和“源流”之争。随着半殖民半封建进一步加剧,甚至出现过“消除中医,消除汉字”等完全否定中国文化的观点、全盘引进外国文化(先是欧美,后是日本,再后是苏联)的观点等等。在持续不断争论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不断地解放。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新文化运动算得上是“看清了世界”。

新文化运动掀起了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新篇章,它带来了“民主”和“科学”,这里的“科学”主要是指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观念层面的科学文化。新文化运动是对1840年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近80年的一个总结,它向国人宣告:科学文化是一种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旧文化;西学是新闻,国学是旧学;科学文化是先进的,是世界文化大潮中的主流,而中国文化已经沦为“地方性文

①童鹰:《世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②《徐光启集》,王重民辑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1—43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

化”。正如陈独秀所说：“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发展和中国的发 展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的话来捣乱。”^①新文化运动造就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繁荣，初步实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还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参与进来，让科学文化拥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这对他们的人生观的重塑有重大意义。

此后，科学文化在中国得到空前的拔高，大批先锋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科学知识、方法与精神的传播。由于对科学文化认识上的偏差，出现了对科学功能的夸大，从而招致“科玄论战”，但大部分知识分子还聚集在丁文江为主将的“科学派”阵营，最终“科学派”占据上风，而以张君勱为主将的“玄学派”只落得“玄学鬼”的下场。“科学派”的最终胜利，表明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当时的中国更需要科学文化，也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逻辑得到了捍卫。“科玄论战”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细致梳理与深刻反省，包括对新文化运动的再反省，表明中国文化的发展从自卑走向自觉。非常可惜的是，随着后来民族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民族存亡的危险再度凸显，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救亡压倒了启蒙，也压倒了科学文化，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再度受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学研究和科学文化建设被纳入社会建制。党和政府仿效苏联模式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组建或重建由中央部门主管或兼管的部属高校以及地方政府主管的地方高校，并迅速出台了 中国科技发展的远景规划。中国的科学研究纳入国家发展轨道，踏上了建制化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十多年，科学研究取得良好开局，推崇科学文化一度成为风尚。“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科学的地位下降，科学文化遭到了政治文化的碾压而衰微。1978 年在全国范围里掀起的“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再度出场，科学与民主得以重新恢复，科学文化的发展迎来了春天。我国的科技事业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科学文化再度彰显。“知识改变命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了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紧接着，知识分子政策得以落实，知识分子的

政治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从曾经的小资产阶级拔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需要改造的对象一下子上升为领导阶级。20 世纪 80 年代后，科学文化走向复兴与繁荣，进入良性的制度化、常态化发展轨道。20 世纪 90 年代“科教兴国”从国家战略上升为基本国策，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科学文化更加昌明。进入 21 世纪，党中央、国务院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为国家战略，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升到发展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科技创新深度嵌入社会生产，再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飙升至世界第二，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人开始对中国特色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产生自信。

中国近现代文化经历的自大、危机、自卑、自觉和自信的曲折过程，让人清楚地看到，科学文化始终充当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增量，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持续动力。或者说，正是中国文化不断吸收科学文化，中国才踏上现代转型之路，并走向复兴。文化自信当然也是建立在科学文化上的自信，建构“科学文化自信”就是要把科学文化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因子，并作为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

三 建构“科学文化自信”的可能性

提出“科学文化自信”的概念，并非闭门造车，更非哗众取宠；它不是坐而论道、自说自话、炮制概念的游戏，而是致力于成为直面、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客观性知识”。

(一) 中国科学文化贯通文化自信的三个来源

如前所述，文化自信三个来源是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观其表，好像并不涉及科学文化，因此有人就认为科学文化与文化自信无涉，这是对习总书记文化自信理论的误读。察其里，就会发现科学文化始终贯通中国文化的发展全程，即始终贯通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其内在逻辑清晰可见。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科学文化的因子，当然这种科学文化属于广义科学文化范畴。诚然，近现代科学并非脱胎于中国古代科学，但从

^①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1918 年第 5 期。

公元6世纪到15世纪长达千年时间里,中国一直占据世界科技的高峰和人类文明的高峰,而此时的西方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在此时段全世界首创性发明中,中国至少占据一半以上。另外,中国古代科学以及科学文化也有着世界意义,李约瑟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就不可能有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①。当然,在整个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传统科学与传统技术的边界并不清晰,因此只存在传统意义的科技文化,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文化的技术文化。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好像越过了成熟的理论形态而直接作用于社会,表现出明显的实用性和经验性,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文化的多元化,绝不是中华民族先天缺乏理论建构的能力。当然,这也跟当时封建专制和“重政轻技”的思想文化有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此处不赘。

中国的革命文化可溯源至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主要形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新文化运动期间,直接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他们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用科学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反思、甄别和选择。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②毛泽东的讲话很好地阐述了科学文化与革命文化的辩证关系:学习自然科学与进行社会革命都是为了争取自由,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不懂科学的革命者不是一个好的革命者”内在地表明:缺乏科学文化的革命文化不是好的革命文化。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虽然当时共产党尚未取得执政地位,但是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并付诸实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除了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号召大家学习自然科学,在解放区广泛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用科学文化破除封建迷信。共产党人努力用科学文化启蒙大众、武装大众,让解放区的劳苦大众的思想得到解放,把土地革命与思想革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科学文化的大发展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四十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这一伟大实践本身就是“科学救国—科学兴国—科学强国”的过程,也是科学从“知识—价值—文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一伟大实践中,科学文化不断融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中国科学文化融会作为人类知识的科学文化

近代意义上科学文化虽发端于西方,但经科学革命,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地方性知识”都在特定时期不同程度地融会到作为“一般性知识”的科学以及科学文化之中,其后“一般性知识”又反哺“地方性知识”,经“一般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交互作用,科学文化已经是一种人类文化,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财富。诚然,西方科学文化曾经为人类科学文化作出巨大贡献,但不能把西方科学文化等同于人类科学文化。

中国科学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在承接世界共性的同时,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中国特色。中国科学文化有着无法剥离的文化底色,比如重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生命体悟的中国传统,强调注重整体、综合、辩证等思维方式。当然西方科学文化也有其文化底色,比如强调理性、批判、分析、精确^③。在不同文明底色上建立起来的科学文化各有所长,需要交流,互鉴共进。基于科学文化的文化自信,不是基于西方科学文化,而是基于人类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碰撞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

此外,中国科学文化因其烙有民族近代史的深深伤痕,反而铸就其独有的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这是中国科学文化的特点和优点。中国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形成一直没有摆脱民族存亡的背景,中国知识分子在选择、吸取、传播和弘扬科学文化的艰难历程中,淬炼出除了具有共性的理性精神、民主思想和自由观念,还锻造了极其深沉的集体感受、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中国科学文化的这种独特气质绵延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且历久弥新,已深深熔铸到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之中。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

^①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③韩启德:《中西方科学文化的同与不同》,《科技日报》2018年9月21日。

新时代,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科学文化中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仍然需要继承和弘扬。

(三) 中国科学文化新主体,即大众主体的出现

人民群众是从历史走向未来的主体,承载着社会进步的全部意蕴。文化自信作为一种对民族文化整体自信的普遍心理状态,它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自信,而不是少数人的自信。

科学研究是少数人的事业,但是科学文化绝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如果说狭义的科学文化是少数科学家或科研共同体创造还能勉强成立,广义的科学文化绝不是少数人创造的。科学文化不能离开主体而单独存在,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人民群众是一切人类文化的创造者,也是科学文化的创造者,更是科学文化前进的推动者。

人类历史上的革命有两种,一种是变革社会制度的人民革命,具有明显的人民性。另一种革命就是科学技术革命,这种科技革命开始是少数人的事业,后来激发出来的科技创新却是大多数人的事业。中国人民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同样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主力军,也必将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当前,中国已进入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时代,大众既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当然也是科学文化的践行主体。实践表明,大量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是基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经验的总结,再进行试验并不断累积研究成果而取得的突破,这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人民群众创造性的劳动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任何科技创新都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毕其功于一人”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是荒唐的。坚持以大众为主体的科技创新导向,既是传统“小科学”走向当代“大科学”的内在要求,也是科学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没有人民群众创造力的自由发挥,一切科学文化建设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科学文化自信”也不会落到实处,终将沦为少数人的自信。

四 建构“科学文化自信”的路径

就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说,科学文化与文化自信的学科归属不一样,大致分属两个学科。前者属于哲学,主要是科学技术哲学;而后者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不

同学科的研究范式有很大区别,相对而言,前者注重学理,潜心挖掘学理深度;后者关注现实,擅长拓展应用广度。前者关心世界,喜欢用世界眼光看中国;后者关注中国,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建构“科学文化自信”势必要求世界眼光和中国情怀相统一,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倡导“实践优位”,处理中西方国家关系倡导“中国优位。”

(一) 破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二元对立的迷信,用人文文化涵养科学文化

1959年,英国学者斯诺在剑桥大学做了一场著名的关于“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演讲,此后,“两种文化”之争引发旷日持久的学术诉讼。经历一个甲子,争论不但未熄,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文化属于强势文化,屡遭非议,甚至带有贬义,在所难免。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现代化有共性的一面,许多中国学者也参与“两种文化”的讨论,确有必要。但中国现代化又极具个性,科学文化的生发语境和西方并不一样,中国学者要沉下心来,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理论奉为圭臬,应该开展深入细致的科学文化的本土研究。

斯诺的“两种文化”在西方盛行无可厚非,它的确是个“真问题”,但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也不完全是个“假问题”。中国学者要有学术自信,要“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千万不要干削足适履的傻事。理论上,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中国并不存在“两种文化”冲突的生发土壤。实践上,自19世纪中叶,西方科学与文化传入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科学文化一直在曲折中前进。即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文化也从未有过西方那样的强势地位。国内学者热衷于对“两种文化”的研究的主要背景是近年来科学技术双刃性的显现,特别是科学技术有可能成为异化的人的手段,学者们追根溯源,把技术的所谓原罪归因到科学文化的身上。

在中国,“两种文化”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理问题,主要是一个现实问题。众所周知,科学文化是作为启蒙资源来到中国的,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被当作旗帜,但随着民族战争以及国内战争爆发,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救亡压倒了启蒙,也一定程度压制了科学文化的弘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科学文化的地位几度反复,甚至遭到了政治文化的碾压。自改革

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迅猛,但科学文化的弘扬与科技事业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只要科学文化未能内化于心,没有深植于民族心理,只要科学未能外化于形,没有成为社会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科学文化的强调就仍然具有合理性。

一切文化都是研究人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本是同根生”,“相煎太急”是因为研究角度、切入点、方式不同,但殊途同归,归于人。科学文化始于物,经人造物,终于人。从自然界的物出发,向内探究物“是什么”和“为什么”,探究物的属性与功能,即“能做什么”,让物(含人造物)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先满足人的低层次的需要,再到高层次的需要。如果把满足人的需要从最初的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上升人精神生活的需要,直至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高度,其实就打通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任督二脉”。钱三强在探讨科学与文化曾经指出“我们讨论科学和文化问题,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启蒙,促进社会主义新的觉醒”^①。这种“新的觉醒”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可以促进民主”的觉醒相对应,在当下可以理解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它内在地表明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并没有天然的壁垒,其间存在着贯通的桥梁。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几度中断,又几度联接,但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科学文化所承担的启蒙使命就有再度唤起的必要。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时间上继起,但在当下中国空间上并存,这一独特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转型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长期性,也意味着消解启蒙,甚至压倒启蒙的因素仍然会出现,对待科学文化的态度也会有反复。只要这种转型没有完成,对科学文化的强调甚至拔高就仍然有其合理的一面。

当前,有些学者倡导建构“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②,试图调和“两种文化”的二元对立,貌似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折衷方案,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最多算是转换了问题。立足中国国情,构造新概念没有必要,仍然可以沿用“科学文化”一词,只要充实科学的内涵即可。这里的科学不仅是自然科学,也应包含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这种科学文化是对斯诺的科学文化的“扬弃”,弥合传统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二分,是涵

盖人文文化的“新科学文化”。建构“科学文化自信”就是建构以“新科学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自信,在彰显中国气派的同时,融入并引领世界学术潮流。

(二)摆脱科学文化的“体用”之争,推动科学文化由“用”及“体”的上向迁移

科学文化是一种“用”的文化,也是“体”的文化,具有“体用”合一的二象性,当然这里的“体用”是极富象征意义。推动科学文化发展,就是要推动科学文化由“用”及“体”的上向迁移,并以此来提升文化自信。

科学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仅是一个科学知识、思想、方法等要素逻辑建构的狭义科学文化,还是一个社会实践建构的广义科学文化。经由科学文化的建构过程,可以把科学文化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作为“用”的文化,即表现在器物层面上的科学文化。由于社会的需要,科学很快技术化,从科学原理到技术原理,由技术原理到技术产品,这些技术产品就是物化的科学文化。其次是作为制度层面的科学文化,大致也属于“用”的范畴。科学文化还将其思想、方法、理念内嵌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而成化为社会建制的有机部分,并在运行中内化为人们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科学化的社会建制,没有超出“器”的范畴,属于“用”的文化。再次,作为观念层面的科学文化是“体”文化,主要是指科学文化给人类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带来的巨大变革,是一种基于科学知识、方法、思想之上的科学信念体系。比如自然规律是客观的、公正的、对每一位研究者是公平的,容易滋生众生平等的观念。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揭示了天体与地面物体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告诉人们天体的运行规律是客观的,进而是可以把握的。它打破了传统的“天尊地卑”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对人类思想解放的意义超出了认识自然、解释自然本身。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人们会形成理性、规范、公平、宽容、批判、创新、协作等科学精神,并将这些精神推广到整个人类生活中,便形成了人们所熟知的求真求新精神、怀疑批判精神、团结合作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等,并渐渐成为人性中最成熟、最重要、

^①钱三强:《联合起来,探讨科学与文化的发展问题》,《科技日报》1988年9月21日。

^②李醒民:《论科学文化及其特性》,《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第4期。

最基本的精神基础^①。显然,作为观念层面的科学文化超出了“器”的层面,上升到“道”的范畴,属于科学文化中的“体”文化。

科学文化中的“用”与“体”不是截然分开的。比如人们在乘坐飞机时,会对飞行所涉猎的牛顿力学定律深信不疑,并对牛顿力学知识、方法、思想等产生强烈的敬畏,这就是由“器”及“道”、由“用”及“体”的过程。科学文化具有“体用”二象性的特点,只是在器物层面的科学文化更多显示“用”的特征,在观念层面的科学文化更多显示“体”的特点。随着科学文化的“用”从最初工具化的器物,到政治、经济运行体制和制度的变革手段,再到对人的现代性型塑的内在要求,科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先“用”后“体”、由“用”及“体”的上升性。

自近代科学产生,以科学知识、思想、方法和精神为内涵的科学文化就源源不断地沿“用”“体”两个方面,深刻地去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在“用”的过程,“体”不断生成与发展,而

“体”的不断完善又规范与引领着“用”。长期以来,国人多遵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实用主义原则,对科学文化的弘扬多停留在“用”的层面。“用”为主角,“体”为配角,甚至退居幕后;作为“体”的科学文化,特别是培养人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意识,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追求人的价值超越等意义彰显不够^②。

建构“科学文化自信”就是基于对科学文化“体用合一”的认识,把科学文化的全部要素,特别是“体”的要素纳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之中,让它在继续贡献其经济价值的同时,渐渐释放它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精神价值,实现科学文化“由用及体”的上向迁移。这种上向迁移就是“科学文化自信”的建构路径,这种建构不同于传统道德的灌输和说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自然而然地将科学文化内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因子,从而自然而然地夯实和提升文化自信。

On the “Scientific Culture Conf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sentology

WU Guang-li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culture confidence” is a kind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based on scientific culture. Putting forward this concept is to show that scientific culture has been acting as the incr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since modern times. It is because the scientific culture constantly internalizes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makes the Chinese culture from arrogance to inferiority and introspection, from consciousness to self-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Building “scientific culture confidence” is to bring scientific culture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building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Consciously complied with the logical purpo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ientific culture, it effectively responds to the practical appeal of building a strong cultural country, realizes the dual effect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culture, and 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Presentology, that is, “necess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scientific culture confidence”, “what is scientific culture confidence”, and “how to construct scientific culture confidence”, we shall build the presence logic and routes of “scientific culture confidence”, promote the study of scientific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find the new resource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with culture” and the new routes of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culture based on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scientific culture; cultural confidence; scientific culture confidence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伍光良,葛菲阳:《新时代科学文化的建构探析》,《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12期。

^②代金平,秦锐:《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应正确处理五对关系》,《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